

註④：一九七一年毛共自稱產糧二億四、六〇〇萬噸，「北京周報」則稱二億五、〇〇〇萬噸。

註⑤：參閱一九七三年六月廿四日聯合國發表的統計公報。

註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國家安全保障政策及科學發展小組委員會於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發表的題為「美蘇通商關係——經濟、科學技術合作及外交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報告中，有此預測。

註⑦：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三日日本「朝日新聞」第九頁。

註⑧：參閱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朝日新聞」晚刊第一頁及七月一日中國時報第一版載六月三十日美聯社莫斯科電。

註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日本經濟新聞」晚刊第二頁刊載該報駐莫斯科的齋藤特派員同月十二日電報導，蘇聯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曾對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日蘇經濟委員會天然瓦斯委員長（東京瓦斯會長）安西浩作此表示。

註⑩：同年六月九日蘇聯華語廣播報導「經互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公報」。

註⑪：同年四月二十五日法新社東京電。

註⑫：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人民日報」刊載毛共政權「發言人」聲明——評蘇聯政府八月二十一日之聲明中說：「據蘇聯領導人說，中國人喝大鍋清水湯，連褲子都沒有得穿，怎麼有資格生產核武器呢？」嗣後陳毅聲言不要褲子要原子彈，即爲此而發。

註⑬：參閱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六日中國時報第四版載莫斯科十五日合衆國際電。

註⑭：同年七月二日聯合報第二版周榆瑞專欄「美俄協議與西歐動向」。

註⑮：同年七月五日美聯社倫敦電稱，「每日電訊報」有此報導。

註⑯：羅吉斯五點和平方案，詳見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法新社赫爾辛基電，六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註⑰：同日美聯社赫爾辛基電，羅吉斯在歐安會中演說，六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英國  
通訊

## 迎接第二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

# 展望我國在國際宣傳外交上應有的措施

劉惠林

第二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將於本年八月在台北市揭幕，作爲時兩星期座談研究與參觀等活動。來自海外各大學一百二十名我國學人與本國專家及學者共濟一堂，互相報告國內外之情況，並對國是問題交換意見，提供心得，作爲國家建設之寶貴參考，洵爲近年來一大事；亦爲自蔣院長經國主政以來，虛心問政於民，所舉辦最具有深長意義大事之一。

國府自從以嚴正之立場，毅然退出聯合國之後，舉國上下在總統訓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大原則之下，力圖奮發，勵行政治革新，進行經濟建設，卒能渡過最艱難、四面楚歌之兩年，一新海內外耳目。身處海外之我

國學人，對此感受尤切。國家建設研究會之一再召開，復令我海外忠貞學人能獲有一難得之機會，一來了解國家建設諸般進步情形，二者使當局集思廣益。可謂兩得其便。此與中共僅以宣傳爲能事，誘騙部份海外學人，赴往大陸觀光，其目的不在虛心接受批評與建議，而在於「統戰」之宣傳伎倆，則有所不同。目下在大陸上之政權，雖因迎合自文革後之國際潮流，而以新姿態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對我海外學人大量爭取。但其實際企圖，乃孤立和打擊我國在海外之力量，作爲其統戰之一環。事實上，中共由於其本身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及其「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之特徵，對海外學人，尤其自文革以

來，視為與其本身利益，格格不入。尤而甚之，對海外學人所孕育之自由民主等西方思想，視為對其所推行之無產階級思想及階級鬥爭為極大威脅。所有知識份子，如非經過「團結、教育、改造」三部曲，均被視為共產主義之外人。職是之故，海外學人被邀往大陸觀光者，充其量不過作為中共海外宣傳之工具。其欲對中共政權有所建議批評或進而擬獻身「祖國」，定居大陸，均被婉拒。此中實情，已由最近中共「國務院」對下屬機構所發有關接待前往大陸訪問各界人士之訓令而揭露①。此與國府所舉辦之國家建設研究會旨趣大異。亦足反映民主與極權之分野及我海外學人之向背情形。

此次國家建設研究會，除其精神與上屆一致外，在組織管理方面，又略有所不同。由於上屆所獲取之經驗，此次在組織上有所改進，較前為嚴謹。大會上主要之特色分組研究亦揆之實際需要，增加研究組別，並妥為分配組合研究人員，俾能作更有系統和更具體之研究。另一方面，此亦足反映主辦當局嚴肅之態度，對遠道回國參加國家建設研究會之我國學人，大力借重其才智，作為國家建設之重要參考。在八項分組研究中，對海外學人關係最切及對國家國際聲譽上最具影響作用者，當推國際宣傳及外交一組。此並非謂其他對教育、科學發展、社會、財政、經濟等研究無關重要。但我國目下處境，乃係對中共極權作殊死鬥爭。其鬥爭範圍既廣且大，由思想、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各方面多管進行。國府在此方面，已卓著成績，雖不能謂已臻至善之境（迄今世上尚無任何國家足當此稱者），但已以事實證明我三民主義之政體及民主政治實優於中共所謂之社會主義制度。如今廣納眾議，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並非難事。再證諸中共近年來對我國諸般惡意宣傳，僅能集中在芝麻綠豆大之小事上攻擊，而未能對我政經各主要方面有所指責，可概其餘②。此無他，事實乃勝於雄辯。若宣傳不成，適足做成反宣傳。中共在宣傳上，一向以善長見稱，此點豈不有自知之明？

在國際宣傳及外交上，中共則挾其新近在聯合國獲得之聲望，處處對國府襲擊，旨在運用世界輿論，打擊我國在國際上之地位，進而予以在世界政治上孤立，並圖瓦解我國經建上之成就。其最終目的，不言而喻。職是之故，我國在此方面之努力，實應列為當務之急。在上屆國家建設研究會上，海外學人曾建議政府應實是求是，切忌作空洞之宣傳③。此實言有未詳。宣傳一事，可分對內對外二種，對內固應實是求是，以取信國人。即對外宣傳，

亦切忌空洞無物，為明眼人一眼看穿。我國在國際宣傳，尤其針對中共方面，往往做得不够，不徹底，且乏主動性。固然，宣傳一事，離不開渲染及高喊口號，中外皆然。惟國府做法，若非失於忠厚，致被小人以欺君子之方；則宣傳時不能在表面上做得天衣無縫，被外人譏為空洞不切實際。在此方面，以宣傳及藉伎倆起家的中共，其做法則大刀闊斧，不惜工本，做得表面漂亮之至，令外人折服，轉而顯出國府對外宣傳，處處落在他人之後。此點在中共尚未與西方釋仇握手言歡之前，還無多大影響。但今時非往昔。如我國尚在國際宣傳，進而在外交上，不積極開展，對中共之宣傳攻勢，以牙還牙，轉而採取攻勢，則非但會影響我在世界上之聲望及地位，且對我廣大海外

華僑，恐為中共所惑，而產生離心之不良現象。在國際宣傳上，目前我國不如中共者，在手法和內容二主要處，均有重行檢討之必要。在宣傳手法上，中共不惜工本，在廣播、報紙、雜誌和書籍方面，大下其手。最近為配合其「和平攻勢」，大量增加其對歐美及台灣之廣播時間。在報紙方面，以香港大公報中英文航空版（英文版為週刊），暢銷歐美地區。在雜誌方面，其在宣傳上所費之工夫，尤為驚人。數種主要定期刊物，均以多種語言發行，其中尤以銷路最廣之「人民畫報」，以十六種不同文字同時發行，其影響世界輿論，潛移默化之功，只有我海外學人，方能親身體認到。在書籍方面，作為宣傳用的，以小冊子居多，藉「國際書店」，統一對外經銷。且視實際情形，以數種文字發行，如為最近紀念台灣「二二八」二十六周年，由「外文出版社」於本年出版「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二十六周年」一書，以英、日等數種文字印行，以配合其統戰陰謀。姑不論其歪曲之內容，在外國文字上，順理成章，讀起來毫無生硬不通之處。此無他，所有外文文字之翻譯，均由「外文出版社」以重資聘請外籍語文專家潤飾，鄭重其事，蓋事關國際宣傳之大事也。反觀我國，除在對外廣播上，因有專台負責尚差可人意外，在報紙雜誌及書籍對外宣傳上，均不如他人。以海外學人本身經驗而言，除中央日報航空版遠銷歐美等地區外，英文版在國外能偶然見到者僅小小一對開張「中國周刊」而已，其內容及銷售範圍，實不能與英文版大公報周刊相比。在定期雜誌方面，經常見到者，可謂鳳毛麟角，更不遑論以多種語言對外宣傳了。至於能用作國際宣傳之外文書籍，非但少得可憐，且大多數翻譯得令人不忍卒讀。縱使一本內容豐富，言之有物，有利國際宣傳之書籍，亦

往往因受翻譯上文字詰屈聱牙之累，而獲得適得其反之作用。此中尤以由國人從中翻英之書籍爲然。往往自持「閉戶造車」之英文根底到家，翻譯（或以英文撰寫之文章）後，自以爲是，不屑請有寫作及編輯經驗之英美本籍人士過目修正，而逕予以出版，行銷國外，令人不忍卒讀。如以此種英文版本，用作國際宣傳，其效果實難令人樂觀。反觀中共之外文出版刊本，其中雖共產八股充斥，但就文字上言，殊無把柄可尋，無形中因使讀者易於閱讀和理解而中其宣傳之目的。我國外文宣傳上之出版物，在此點上極需改進。茲舉一近例爲證。由胡璞玉所編之有關 蔣總統在軍事上之勳功偉業，於去年由國人翻譯成英文版，題爲「The Military Exploits and Deeds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Taipei: Chung Wu Publishing Co., 1972)，大量分贈國外各大學機構並於今年添印英文第二版。印刷精良，內容亦極翔實，對宣揚我 總統在國外之聲望及地位，不失爲恰當之宣傳。際國步維艱之日，此書與中文本「蔣總統傳」及「黃埔建軍」兩書，相得益彰，足以振奮人心志氣。在國際宣傳上，有矯正被中共所歪曲的我國歷史，與前由同一出版公司出版之英文版「抗日戰史」(History of Sino-Japanese War)，均有助我國國際宣傳<sup>④</sup>。但美中不足者，「蔣總統在軍事上之勳功偉業」英文版，受翻譯文字大欠通順之累，令人讀來費力非凡，對書內之中式英文造句及中式英文成語，使人有莫測高深之感。此種翻譯實貽笑外人，用之於國際宣傳，則連累本書之內容，使讀者擲書而歎。此種因小節疏忽而牽連大局，若事先請外籍語文專家過目，則可免此弊。由此小事，亦可見我國在國際宣傳上實有「馬虎」之嫌。有關該書之書評，當另行撰寫刊出。

捨宣傳上所用之媒介物不談，在內容及技術方面，我國在國際宣傳上，亦有商榷之處。我海外學人，能親身體驗到的，有如下二項。第一是不善變。第二是缺乏主動的精神，導致在宣傳上之內容，守勢多過於攻勢。關於不善變之一點，一半由於我立國之精神，以仁厚爲本，君子爲度，詭辯宵小之事，往往不屑爲之；另一半由於對國際宣傳，缺乏認真的態度。茲以中共近日所鼓囂之「統一問題」爲例，在美國一地攪得有聲有色。致一班對中共本質缺乏深切認識的我國僑胞及青年留學生每易墮其術中。事實上，中共所要者，非「統一」，而是「併吞」，假統一之名而行之。在國府方面，認爲我對中共，並無統一問題之存在。中共乃我國叛逆，我自應征討消滅之。因此之

故，絕口不談也不屑高談惠而不實之統一，而堅持以往一貫不變之口號。此在我國人士看來，乃理所當然之事，但在勢利眼之國際上，因口號與現實脫節，而流於空洞。其實，在國際宣傳上，尤其在與我國向無邦交之英國，亦不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現實之外國人眼中，也談「統一」，至於如何統一法，我自有的固定國策，不必也不需要向外人解釋。反正宣傳是一回事，是否能真正做到，又是另一回事。因此爲何不藉反宣傳以瓦解中共之宣傳攻勢？但國府往往爲堅持大原則，而不願在表面上變通辦理，因此在國際宣傳上便吃虧不少。同時亦由於在國際宣傳上不善變之故，導至在宣傳上缺乏主動性。中共在文革後，能以一百八十度之大轉變，由仇視西方而採取和平攻勢，組成各式各樣五花八門之文化訪問團，實行兵兵外交。轉眼間，便將西方各國對彼等之惡劣印像改變過來。此皆賴主動宣傳之功。事實上，中共此舉，實由於與俄共交惡所致。基於政治及經濟上之需要，導至在國際宣傳上之一大轉變。在對我海外學人，又因基於在新形勢下實行新統戰之要求，而高喊「認同」與「回歸」二大口號。反觀我國，自退出聯合國後，在國際宣傳上，被動多於主動。雖然並非所有被動宣傳，就不能生效。吳俊才以國民黨中央工作委員會主任之身份，對「認同」與「回歸」兩攻勢，提出有力之反駁，申論認同並不等於認共，回歸並不是返回共產主義之大陸。推而言之，反共不是反華，愛國必須反共<sup>⑤</sup>。此種有力量有內容之反宣傳，在國際宣傳上則頗有份量，亦足解我海外人士之疑惑。但被動之反宣傳，尙需正面宣傳攻勢配合，方可發揮在國際宣傳上絕大之效用。中共迄今對我國所懼者，並非我國繼續存在，妨礙彼之「統一」，而在於「台灣」一旦宣稱獨立，彼之所有宣傳攻勢及統戰便會全盤落空。在此方面，中共實應感謝我 總統一貫堅決重返大陸復國滅共之國策。蓋在此國策之下，無所謂「台灣問題」也。惜國府由於責任感所驅使，雅不願在此方面做空白文章，不然在國際宣傳上，當有一新耳目之感，並將一舉瓦解中共之統戰伎倆。「爲達目的，不擇手段」，在詭辯的中共可以做到；但在正直仁義的國府，則不屑爲之，吃虧自意中矣。

話雖如此，在別的方面，採取主動宣傳之機會，並非沒有。但國府有關部門，似尙未全力注意於此，進而對我在國際宣傳上之工作，無形中打了折扣。遠的例子不說近例中，對中共近日大力提倡之「文字改革」一事，正好

主動採取宣傳攻勢而予以攻擊。中共自本年五月起，在「光明日報」上恢復「文字改革」半月刊，其動機乃根源於毛澤東於一九五一年時所作之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sup>⑥</sup>，文字改革之陰謀昭然若揭。其改革之原因，實乃基於「人民民主專政」之需要，有利於政治思想上之宣傳及控制，普及教育云云，無非掛名而矣，文革後之今日，重提此事，其意義自不比尋常，牽涉我國固有傳統文化之傳遞及發揚。此種重大事項，國府迄今在國際宣傳上似尚未採取行動。致國外人士錯覺以為文字改革乃是在中國文字上一個必要之過程。另一方面，中國文字拉丁化，對外人而言，自然容易學習。但對我國人及固有文化，將是一項無法估計之大損失。此事在國際宣傳及對大陸宣傳戰中，自有矯正視聽之必要。

宣傳與外交，兩者互為因果，我國今日在外交上處處居於下風，雖有世界政治因素在內，但平日缺乏強力之國際宣傳，亦有以致之。自西方國家相繼與我國斷絕外交關係後，在今日西歐中，僅葡萄牙與我尚維持正式邦交。在世界各大國中，亦僅美國一國而已，然美國亦非絕對可靠，彼今日慨然能與中共互設大使級之「連絡處」，他日焉知不可真除？我國外交上之艱苦，險象環生，自不必諱言。政府當局，乃轉而從事經濟文化外交，用心不可不謂良苦，與惡劣環境奮鬥之精神，不可不謂不堅強。但展望將來，如今尚非安泰之局。今後應如何合縱連橫，以鞏固我外交上之影響力量，自為當務之急。外交上不外政治力量之運用，權謀之應變。只要不妨礙國策，凡不與我為敵者，均可化為我友。推而言之，今日中共既然能與昔日不共戴天之仇的美帝國主義為友，我與友善對我支持之東歐等共產國家為盟，亦有何妨？倘堅持原則，一成不變，則外交工作之推展，豈非強人所難？除官方外交外，民間之國民外交，實亦不可忽視。中共在此方面，以半官方「友好協會」名義，做得有聲有色，此為善於運用外交之一例。或謂我國目下財力有限，國民外交，所費非貲。但我國在海外有大批華僑及學人，如能委托舉辦各種國民外交活動，或予以國民外交團體名義，當有助於國民外交之開展，對改變國際人士對我之觀點及立場自不無所補。以英國一地為例，我國在此間之國民外交，除倫敦自由中國中心歷年來「慘澹經營」尚著有成績外<sup>⑦</sup>，其他國民外交，一付缺如；即「英國同學會」亦一再難產。反觀中共在此之民間團體

，在英倫以英「中」了解協會為代表；在蘇格蘭以「中」蘇友好協會領導，大做其國民外交兼國際宣傳。未知國府有否注意及此？

但願我國能以「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為基礎，積極開展我在國際宣傳外交上之攻勢，以重振我國在國際上之聲望與地位，並為國家建設奠下有利之外來因素。  
(一九七三年七月書於英國愛丁堡大學)

註①「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接待外國人，外籍華人，留學生，一般華僑的指示，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一日」，原文刊載於香港展望半月刊，No. 263 (16 January 1973), p.16. 有關該件之分析及評論，參閱·Liu (William H.), THE DILEMMA OF CHINESE COMMUNIST OPEN-DOOR POLICY IN THE POST-CULTURAL REVOLUTION ERA, Issues & Studies: A Monthly Journal of Communist Problems and World Affairs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IX, No. 8 (May 1973), pp. 45-51.

註②參見香港大公報(海外航空版)有關「台灣零訊」「台灣內外」等專欄，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十六、二十三、及二十四日。

註③「擴大國際宣傳，打擊共匪陰謀」，中央日報(國際航空版)，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九日，p.1.

註④有關「抗日戰史」英文版之書評，參見Liu (William H.),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ssues & Studies, IX, 9 (June 1973), pp. 87-91.

註⑤有關吳俊才之講詞，見中央日報，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及十二月十日，p.1.

註⑥「漢字字數必須進一步精簡」，「北京」光明日報，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p.4.

註⑦有關倫敦自由中國中心在國際宣傳上之貢獻，參閱·劉惠林著「康德黎先生後世及其與中華民國之關係」，東方雜誌(復刊號)(台北·商務印書館)，第六卷，第二十期(一九七三年六月號)pp. 76-80.